

“永明体”与永明时代再探

袁济喜

【摘要】 永明体是南齐永明时代产生的诗歌流派。永明时代外表承平，实则统治集团政争异常激烈，酝酿着祸乱，士人游移于各个政治派别与集团之间，心态十分复杂，他们通过粉饰太平，探讨诗歌的声律问题，催生了以“四声八病”为内容的永明声律说，永明体在此基础上形成。永明体的形成与时代关系极其复杂，并不仅仅是外表承平的简单反映，对于它的研究，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揭示其本来面目。

【关键词】 永明体；永明时代；文人集团；声律说

【作者简介】 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永明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南齐永明年间产生的一种文体现象，它以内容华靡、讲究声律、形式工美为特征。南齐武帝萧赜即位后的永明年代，是南朝重要转折年代，也是学术繁荣、文学昌盛的时代，出现了以沈约等人为代表的永明体现象，对于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然而，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存在着将永明体等同于永明文学，进而与整个永明时代相割裂的现象，遮蔽了整个永明体与永明文学的本来面貌，导致了我们的整个永明体与永明文化的看法囿于一隅，未能窥其全貌，其主要问题在于：一是永明体可否作为永明文化的主流；二是永明体是永明时代的正面反映，还是一种逆向的折射？本文拟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永明政争与文人境遇

对于永明文学与文化的观察，首先离不开对于整个永明年代的政治与文化的基本分析。永明时代与永明体的关系，究竟是顺向的反映、还是逆向的折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对这个时代的政治情境，特别是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政争做具体而细致的分析，才能勿为承平表象所迷惑。

永明（483—493年）是萧齐武帝萧赜的年号，是萧赜继齐高帝萧道成之后称帝统治的时期，共计十一年。不可否认，永明年代是一个外表承平的年代，《南齐书·良政传》载：“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袿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①这段文字的作者萧子显本身是一位文学家，擅长语辞，另外，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文献王萧嶷第八子，与南齐皇室关系密切，因而对于永明年代不乏溢美之词。刘宋时代宋文帝立儒玄史文四馆，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儒学仅为其一，萧道成、萧赜父子有鉴于此，大力弘扬推举儒学，特别是孝道。在他们的举荐下，形成了以王俭为首的儒学集团，推动了儒学的昌盛，对于改变刘宋的学风与士人追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资治通鉴》评价：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四部之学与中国文学形态构建”（17XNL012）

^① 萧子显：《南齐书》，62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俭少好《礼》学及《春秋》，言论造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术。”^① 竟陵王萧子良则形成了竟陵八友的文士集团。儒学集团与文士集团既互相勾连，又互相制约，形成了永明文化的特殊风景，当时的统治相对于刘宋时代频繁的内乱相对承平，这也是无可否定的。

然而，永明年间却是一个与魏正始年代十分相似的年代，永明年间的十一年（483—493年）与正始年间的十年（240—249年）非常相似，即外表的学术与文化繁荣恰恰是内在政治凶险的折射。关于这一点，是目前研究永明体与时代关系的论著最忽视的。齐武帝外表喜怒不形于色，实际上内心的忌刻与猜忍不亚于刘宋时代的那些皇帝，他即位当年即杀死了他不喜欢的文士谢朝宗，原因是谢的不恭。^② 对于竟陵王萧子良的招集门客、延揽文士，他一直心存戒备，他在病危时放弃萧子良，导致萧子良文人集团的败灭，其是负有直接责任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永明文士集团，一半是文士，另一半的身份则是谋士。在永明年间，皇室内部、皇室与外藩、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始终不绝如缕，可谓步步惊心。齐武帝深知他的父亲萧道成是靠篡位取得皇位的，因此，对于皇室内部与外臣防患很严密，刘宋时代的典签制度依然承袭下来，导致永明年间他的儿子萧子响因不堪典签的苛刻而造反，最后在萧贲发兵平叛后被杀，萧贲事后也深感悔恨。正是对于皇室的猜忌，他对于素有贤明之称的儿子竟陵王萧子良并不信任，关键时刻将继任大权交给萧昭业与萧鸾，导致萧子良被黜，最后郁郁而亡，萧鸾即位为齐明帝后，将萧道成与萧贲的子孙辈诛杀殆尽，留下了为后世唾骂的恶名，比诸刘宋朝的皇室骨肉相残有过之而无不及。竟陵八友之中的萧衍，即后来的梁武帝在这场政争中悄然崛起，最后取代萧齐，成为最大的赢家，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可见，齐武帝在位的永明十一年，表面承平，实际上正是酝酿祸乱的时代，永明体与永明文学外表的繁荣，恰恰是这种表象的虚饰。

当时的文士，也就是永明体的主体作家，如沈约、范云等人，卷入了永明年间的政争，其中又分几类人：一是死心塌地投靠诸王、以身家性命博弈，比如竟陵八友的王融，出身琅琊王氏，才华出众，深得萧子良信任，因此，竭力帮助萧子良在齐武帝病重时谋夺大位，关键时刻功亏一篑，在萧昭业即位后旋即遇害。范云则始终助力萧衍即后来的梁武帝谋位。二是善于观风使舵者，比如沈约，先为文惠王萧长懋的太子家令，后又投靠竟陵王萧子良，在文惠王死后改换门庭，成为萧衍的谋士，帮助萧衍夺取政权，取代萧齐，建立萧梁政权。三是游移不定之士，如任昉这样的人物，由于政治根基不深，又没有高门甲第的家世背景，只好游移于各个实力人物之间，择主而事。四是还有一种人物虽然出身于世家大族，但是在萧齐时代，王谢家族已然中衰，只好在新旧王朝与各个皇帝之间求生，始终无法摆脱谢灵运那样的政治悲剧，永明体最有成就的诗人谢朓即是这种人物。而永明体的咏物写志，大都不出身边琐事，嘲风雪，弄花草，与文士在政治斗争中的这种游移不定、得过且过的人生态度与人格精神有关。

永明时代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生成的，它是从刘宋向梁陈转变的契机，其基本特征是由刘宋时代的重文章转向崇尚儒学。刘宋时代是南朝第一个由军功集团秉政的政权，虽然自宋武帝开始，重视文教，但是由于这个统治集团的成员大部分是由北府兵将领及其后代所构成的，没有积累的基础，再加上皇室内部的骨肉相残不断，形成了特有的刻薄残忍的政治传统，延及文化，也是外表光鲜而内里脆弱，统治者依照个人的爱好来对待学术，且游移无定，随心所欲。刘宋时代出现了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鲍照、颜延之，再加上江淹等人的助推，诗文创作取得了很大的

①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4266—42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② 《南齐书·谢超宗传》记载：“永明元年，敬儿诛，超宗谓丹阳尹李安民曰：‘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尹欲何计？’安民具启之。上积怀超宗轻慢，使兼中丞袁象奏曰：……”最后齐武帝将谢超宗赐死。

成就。在学术文化上，虽不乏各种举措，如宋文帝设立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等四馆；宋明帝设立总明观，又称东观，设儒、道、文、史四科，但是始终没有将儒学的礼学与典章制度的考稽作为核心价值来构建。永明礼学正是有鉴于汉魏以来，儒家学术的衰落、礼制的缺失而构建的。刘宋时代开四馆，兼容并包，但萧齐皇朝看到了政治的危局在于没有儒学的支持，因而大力扶持儒学。《南史·刘瓛传》记载：

齐高帝践阼，召瓛入华林园谈话，问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又谓瓛曰：“吾应天革命，物议以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轨之失，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必危。”及出，帝谓司徒褚彦回曰：“方直乃尔，学士故自过人。”^①

这一段对话对于了解永明文化的导入与永明文学的背景很有益处。齐高帝萧道成所以深赏刘瓛之语，是因为刘所说的“政在《孝经》”，深契其心，而刘瓛的这句话也是有鉴于宋亡而言的，君臣之间在如何构建萧齐文化的根基问题上可谓一拍即合，莫逆于心。萧齐开始，南朝文化对于儒家礼学的重视进入了新的阶段，一直延续到梁代。

这当中的重要人物当属王俭。王俭与刘宋时期的儒学人物相比，在于其中的三个要素：首先，他熟悉礼学中的典章制度，小学根底极深，《南齐书·王俭传》记载他年轻时即“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②。刘宋时代的学术较为驳杂，缺少内在的联系，而王俭能够举重若轻地依据自己所熟悉与研习的礼仪用之于朝政。王俭为此召集了许多专业人士，以制礼作乐，兴废继绝。古代礼乐繁杂，有许多专门化的知识，需要专门的人才来研究与确定，而王俭帮助齐武帝完成了这项工作。其次，王俭善于将古礼与今用相融会。古礼废弃已久，不可能原封不动的搬来运用，必须有所损益改革，王俭以其明断，加以改易，利于施行。《南齐书·礼志上》记载：“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文多不载。”^③这些说明了王俭博学多才，通晓时变，能够将古老的礼乐制度与时世需要相变通。第三，王俭具有人格风仪之美，深为士子所服膺，王俭善于引纳人才，在士子中具有广泛影响，成为士流心目中的偶像，他也经常以江左风流宰相谢安自居。这些综合因素，促使南齐永明文化向着儒学方向发展，改变了刘宋时代重文学而轻儒术的风习。

王俭对于当时盛行的以诗文娱乐朝政的风习是看不惯的，曾经采用婉曲的方式加以讽喻。《南齐书·王俭传》记载：“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后上使陆澄诵《孝经》，自‘仲尼居’而起。俭曰：‘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张子布更觉非奇也。’寻以本官领太子詹事，加兵二百人。”^④从这些记载来看，王俭自觉地用礼学来抑制当时的娱乐朝政、文恬武嬉的风气。王俭代表着永明时期的儒学集团，与竟陵王萧子良名下的文士群体颉颃相抗。

王俭之所以赏接钟嵘，主要是钟嵘的《易》学造诣。《梁书·钟嵘传》记载：“（钟）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⑤可见，钟嵘这样的诗评家在永明年间出名，主要是因为易学而非文学。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钟嵘以《诗品》向沈约求誉却受到拒绝，说

① 李延寿：《南史》，823-82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②③④ 萧子显：《南齐书》，288、81、29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⑤ 姚思廉：《梁书》，4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明当时文士并不受沈约这样的文坛显贵重视。刘勰的《文心雕龙》虽被沈约虽称道,“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然而沈约并没有加以推荐,“未为时流所称”的命运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齐武帝萧赜好儒学,而他的儿子竟陵王萧子良则喜欢延揽文士,嗜好学术,所谓“竟陵八友”应运而生。萧子良是永明文人集团的首领,然而其政治识见与胆略却很庸鄙。萧子良集团中最重要的的人物即是王融,此人不仅为竟陵八友中的重要人物,更是一位具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不过如同三国时魏正始年间曹爽集团中的何晏一样,志大才疏,当断不断,最后死于非命。王融不仅投靠萧子良,对于当时的萧衍也另眼看待。而萧子良结交这些文士,除了气味相投之外,更有政治意图在内。《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记载:“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① 竟陵八友积极参与当时的帝位之争由来已久。萧子良的这些举措,一方面是传承古代养士之风习,另一方面显然也与他的争夺帝位的心思有关。但是萧子良与正始年间的曹爽一样,是一个没有政治远见、性格懦弱的首辅。萧子良在齐武帝病重时,没有抓住机遇,反而将权柄授予野心勃勃的西昌侯萧鸾。《资治通鉴》卷一三八永明十一年记载:“初,西昌侯鸾为太祖所爱,鸾性俭素,车服仪从,同于素士,所居官名为严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遗诏,使竟陵王子良辅政,鸾知尚书事。子良素仁厚,不乐世务,乃更推鸾,故遗诏云‘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子良之志也。”郁林王萧昭业即位十余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险躁轻狡,招纳不逞,诽谤朝政。王融求援于竟陵王萧子良,子良忧惧,不敢救。遂于狱赐死,时年二十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萧鸾秉执大权后,即杀害萧昭业。文惠太子早就看出萧鸾的凶残,但是没有引起萧子良的警觉,反而为之缓颊,最终招来子孙灭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三八记载:“太子素恶西昌侯鸾,尝谓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当由其福薄故也。’子良为之救解。及鸾得政,太子子孙无遗焉。”^② 许多士人参与政争,无法解脱,死于非命。《南史·王融传》记载:

先是,大学生会稽魏准,以才学为(王)融所赏,既欲奉子良,而准鼓成其事。大学生虞羲、丘国宾窃相谓曰:“竟陵才弱,王中书无断,败在眼中矣。”及融诛,召准入舍人省诘问,遂惧而死,举体皆青,时人以准胆破。^③

当时因为政争与杀戮横行而吓破胆的文人绝非个别,在这种残酷的永明政争中,永明体作家的内心世界,也绝非宁静怡然,他们的文学作品与文学主张,不可能脱离当时险恶的政争而超然物外,只是采取的应对措施在讲究诗歌的声律追求以及相关的创作特点上,这一点应当是肯定的。

二、永明文人活动分析

对于永明体的正确认识,还须对于萧子良的文士集团活动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在当下许多研究永明体的论著中,往往将萧子良文士集团与诗文创作联为一体,而忽略了其中的具体内容,似乎萧子良文士集团纯粹是一个诗文酬唱的文士集团,永明体则是在这种诗文酬唱氛围中形成的,这一看法其实是以偏概全。

应当承认,萧子良当时招集竟陵八友,以文会友,确实声势浩大,除竟陵八友外,还有一大批文士陆续参与,如宗夬、王僧儒、孔休源、范缜、江革、谢朓、张充、王思远、陆慧晓、柳挥、刘绘、虞炎、王亮、丘国宾、萧文瑛、丘令楷、江洪、刘孝标等,这一集团与王俭为首的儒学势力客

^① 萧子显:《南齐书》,47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②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43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③ 李延寿:《南史》,3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观上有抗衡之功能。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萧子良开西邸，并不仅仅是为了诗文酬唱，而是从事以佛学为主的宗教活动，萧子良在佛教事业上的投入，远远胜过他在诗文活动上的功夫。据刘跃进先生统计，当时萧子良发起的大型佛学活动有三次：一是永明初年，萧子良集名僧于建康讲论佛学，同时，又与文惠太子一起召开众僧大会，论辩佛道异同。二是永明五年，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①。三是永明七年、永明十年，萧子良又招集众僧论新声，而永明声律说的出笼，与此次的造经呗新声相关。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认为此次集会“当时考文审音的一件大事”^②。这些礼佛活动，引起外界对萧子良的非议。《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记载：“又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③萧子良的佛学活动，最引起争议还是他与范缜关于神灭论的争议。据《梁书·范缜传》记载：“初，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④萧子良倡导佛学，固然与自己的信仰相关，但同时也与抑制王俭与齐武帝提倡的儒学有关。萧子良自己并无文学天才，他感兴趣的是劝诫之语，因为后来继位的郁林王萧昭业素来猜忌萧子良，萧子良在永明之后郁郁去世，萧昭业总算松了一口气。当然，竟陵八友活动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诗文酬唱、辞赋创作之类，这一点不可否认。

永明年代以萧子良为代表的文士的学术活动主体并非考论声律，声律考论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术单元，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今人研究永明声律说与永明体，不能脱离永明文化与学术的总体环境，这样才能厘清它产生的原委。当时文章与谈义往往相提并论，是指与学术相关的内容，《南齐书·刘绘传》记载：

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时人为之语曰：“刘绘贴宅，别开一门。”言在二家之中也。^⑤

可见，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延揽文士，活动的内容并不仅仅是诗文酬唱，还包括清谈。文章与谈义并列，说明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文章并非写作诗文之事，而是传统的文章博学之义，指学术论辩一类的内容，早在魏晋玄学与清谈中，言辞的音韵声律就成为表达的重要内容，清谈促进了言辞中的声律协调，音调铿锵、抑扬顿挫亦是自然中事。结合永明时代的整体学术氛围，诗文的声律之说只是整个永明文章谈义中的一部分，片面夸大与孤立地考论诗歌的声律说，并将其无限放大，显然有失公允。

永明时代，学术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态势，与文学活动直接相关。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活跃于永明年间的一些人物看出。张融就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为人放荡不羁，颇有魏晋名士风度，《南齐书·张融传》记载：“永明二年，总明观讲，敕朝臣集听。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饮之，难问既毕，乃长叹曰：‘呜呼！仲尼独何人哉！’为御史中丞到搆所奏，免官，寻复。”^⑥张融嘲笑孔圣，为时人所纠，为此罢官，但寻即复官，说明永明时代的官场还未严苛如正始年间，“太祖素奇爱融，为太尉时，时与融款接，见融常笑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在学术上，张融提出了打破戒律，不拘一格的主张，本传记载：“永明中，遇疾，为《门律自序》曰：‘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

①③⑤⑥ 萧子显：《南齐书》，473、475、570、49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②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④ 姚思廉：《梁书》，462、46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①张融精通声律,但他与沈约以声律自诩的态度不同,将声律置于自然为文的基础之上。萧子显评价张融“诞不越检,常在名教”,是很到位的。

与张融相好的周颙精通声律,也是一位儒道佛玄兼修的人物,《南齐书·周颙传》记载:“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泛涉百家,长于佛理。著《三宗论》。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设不空假名难空假名,设空假名难不空假名。假名空难二宗,又立假名空。”^②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周精于声律音韵,是从佛学发端而来,依托佛学而构建,并非发源于诗歌声律。永明声律说的重要人物张融、周颙的声律说与沈约的四声八病说的来源理论,有很大的不同。

在永明文学活动中,诗歌创作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据逯钦立先生所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全齐诗》337首,大部分的诗人生活在永明前后,永明体的代表作家沈约、谢朓、王融的作品数量较多。永明体的一大特征是从当时民间诗乐中汲取了滋养,用以填补文人诗歌作品内容的空虚。《南齐书·王僧虔传》记载王僧虔批评当时的风气:“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③永明时代的文士关注民间歌诗,固然有创新的因素,但是也反映了士大夫精神空虚、追求刺激的心态。

永明体的最大成就是将声律论初步运用在五言诗的写作中,对于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作出了铺垫,但是题材狭窄,情志浮靡,流于生活的表面,而缘饰以声律。比如王融的《渌水曲》:“湛露改寒司,交莺变春旭。琼树落晨红,瑶塘水初绿。日霁沙渚明,风泉动华烛。遵渚泛兰觞。乘漪弄清曲。斗酒千金轻。寸阴百年促。何用尽欢娱。王度式如玉。”^④这首五言诗是典型的宫廷诗,诗中以吟咏渌水为内容,字句雕琢,意态浮泛,了无趣致。王融的另一首《芳树》诗:“相望早春日,烟华杂如雾。复此佳丽人,含情结芳树。绮罗已自怜,萱风多有趣。去来徘徊者,佳人不可遇。”^⑤也体现出这样的味道。这些诗歌是齐梁宫体诗的前奏,大抵是宫廷文士的酬唱,价值不大。而永明体的声律与其内容的靡丽是相配合的,《南史·庾肩吾传》记载:“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⑥说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后来宫体诗正是缘此而形成的。永明时代的乐府歌诗,率多浮夸,用以粉饰太平。《南齐书·乐志》记载:“《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⑦例如,王融《永明乐》诗:“幸哉明盛世,壮矣帝王居。高门夜不柝,饮帐晓长舒。总棹金陵渚,方驾玉山阿。轻露炫珠翠,初风摇绮罗。西园抽蕙草,北沼掇芳莲。生逢永明乐,死日生之年。”^⑧沈约诗:“联翩贵游子,侈靡千金客。华毂起飞尘,珠履竞长陌。”^⑨谢朓诗:“帝图开九有,皇风浮四溟。永明一为乐,咸池无复灵。民和礼乐富,世清歌颂徽。鸿名轶卷领,称首迈垂衣。”^⑩谢朓永明五年时24岁,作《永明乐》十首,主要为歌舞升平之作,从写作的场合来看,诗赋大多用于奉和帝王之用。从齐高帝萧道成到齐武帝萧赜,这种好文的风气一直延续了下来,但主要囿于宫廷文学的范畴。

当然,这种情况到了永明末年有所改变,当时险峻的政治局势愈来愈迫近,文士们不可避免受到感染。永明九年至十一年,谢朓前往南齐萧子隆处任职。《南齐书·谢朓传》记载:“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长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动,密以启闻。世祖敕曰:‘侍读虞云自宜恒应侍接。朓可还都。’朓道中为诗寄西府曰:‘常恐鹰隼击,

①②③⑦ 萧子显:《南齐书》,494、496、401、13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④⑤⑧⑨⑩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386、1389、1393、1624、14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⑥ 李延寿:《南史》,83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秋菊委严霜。寄言罽罗者，寥廓已高翔。”^① 谢朓为长史王秀之所谗，被迫离开萧子隆幕府，还都途中寄诗抒发了内心的忧惧，最终未能逃脱凶险，在政争中罹祸而亡。然而，这种诗歌在永明体诗歌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并不能代表永明体的主流。

永明时代的文学，除了诗歌外，还有各类文章，这些文章往往比诗歌成就更大。《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记载：“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② 其中尤以任昉的文章最为有名。《梁书·任昉传》记载：“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③ 梁代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指出：“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④ 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永明年代文体的布局：作为声律说肇始的永明体诗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作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沈约当时除了诗文写作之外，最有成就的恐怕是他的史传写作。《宋书·自序》云：“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颇好学，虽弃日无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将军蔡兴宗为启明帝，有敕赐许，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书，凡一百二十卷。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永明初，遇盗失第五帙。建元四年未终，被敕撰国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兹王役，无暇搜撰。五年春，又被敕撰《宋书》。六年二月毕功，表上之。”^⑤ 据陈庆元的《沈约集校笺》所附沈约年谱，沈约在永明五年开始，奉齐武帝之命，开始写作《宋书》，同时还写作《晋史》，永明六年完成，是年与谢朓等人创立永明体。^⑥ 沈约所撰《宋书》在史学上成就颇高，永明声律说正是在其中的《谢灵运传论》中提出的。而此时沈约所撰的诗歌，主要是奉和竟陵王萧子良所作，如《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王融、范云同赋）、《奉和竟陵王药名诗》、《和竟陵王抄书诗》、《奉和竟陵王经刘瓛墓诗》，以及咏物、酬唱之作，成就并不高。这些分析，都充分说明永明文学中，与永明体相关的诗歌作品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且并不占主体，用永明体来指称永明文学的全貌，进而将永明体说成是永明时代的文化主流，显然偏离了历史事实。

三、如何考量永明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永明体并非永明文化，甚至也不是永明文学的主流。永明声律说的倡起，与沈约的人生经历与彼时的文学创作策略直接相关，是沈约当时在永明年间外表承平、内里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的一种虚与委蛇、粉饰太平、逃避现实的文学主张。

在南朝时代，沈约是对于政治与人生最富有政治嗅觉与敏感的人物，一生摇摆于上层政争的风浪中，历仕宋齐梁三朝，最终未能逃脱政治的残酷而死于不测，死后还倍受侮辱，是南朝文士兼官僚中的悲剧人物代表。《梁书·沈约传》记载：“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虏将军。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诛，约幼潜窜，会赦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⑦ 据记载，沈约的父亲沈璞就是在宋齐易代凶险的政变中迎事新主略微迟了一些遭受杀身之祸，虽然沈约后来的《自序》中为父亲辩白，但是不争的事实就是生父在元嘉末年宋齐易代险恶的政治斗争中失足而死的，而沈约因此年少时到处流寓，受尽苦难，于是他才发愤读书，同时也学会

^{①②} 萧子显：《南齐书》，558-559、47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③④⑦} 姚思廉：《梁书》，171、479、15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⑤ 沈约：《宋书》，1644-16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⑥ 陈庆元：《沈约集校笺》，557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了政治斗争中的乘时藉势，擅长投机，虽然受到后人的诟病，但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在《郊居赋》中自叹：“迹平生之耿介，实有心于独往。思幽人而轸念，望东皋而长想。本忘情于徇物，徒羁继于天壤。”^①未尝不是他在宋齐梁三朝任官时的心态写照。

永明年间，外表承平，而几大政治集团以招集文士的方式来笼络人才，扩充地盘，聚集势力，为最终夺取帝位早做准备。沈约最早投靠文惠太子，为太子家令，深受宠信，同时又靠近当时另一位大人物，这就是竟陵王萧子良，“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邪王融、陈郡谢朓、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齐武帝对于当时势力最大的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集团一直心存忌惮，关键时刻没有授予萧子良兵权，即是明证。而沈约等人在齐武帝心中乃文士而已，不被重用。《南史·刘系宗传》记载：“系宗久在朝省，闲于职事，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②

而沈约永明五年虽然加入西邸集团，但是他对于竟陵王的能力与人望是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不足以成就帝业，因此，一直对于同为竟陵八友的萧衍抱有希望，将自己的人生希望的砝码放到萧衍身上，果然，萧衍在政变成功，取代萧齐后，对沈约大加赞叹。《梁书·沈约传》记载：

高祖召范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云曰：“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③

不过，沈约的这种政治投机，虽然获得了许多荣利，但是也为时人所诟病。对比永明年代的任昉与江淹，我们可以看到沈约简直是一位官场油条，江淹当时虽然官位显达，但是在永明末依然敢于大胆弹劾不法官员，闻名天下，号称“严明”。任昉为政清廉，不避权贵，提携后进，梁代刘峻写《广绝交论》是加以盛赞，沈约的为人与他们相比，就差强人意了。《梁书·沈约传》评论他：“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谈。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勤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④至于他的文名，钟嵘《诗品》中评论：“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遑，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江矣。”^⑤钟嵘批评沈约在永明年间主要是当时“谢朓未遑，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言下之意，沈约成为文坛首领是因为时代机缘所致，并非他的文学成就，故而将他的五言诗列入中品，加以讥诮。

沈约的永明年间的生活与文学创作，带有当时的时代特点，主要是虚与委蛇、观风使舵。他的诗歌写作与诗歌主张，并不是永明年间承平景象的真心讴歌，而是对于外表承平、内里险恶实质的应对，可以说是一种人生态度与文学写作策略。沈约的永明声律说与他的文学主张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之处。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史臣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飏流所始，

①③④ 姚思廉：《梁书》，160、159、16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② 李延寿：《南史》，128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⑤ 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① 值得关注的是，沈约的声律说是从他的文学史论中导出的，并非泛泛而谈。沈约认为人秉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情志既动，乃发于文。这种文学起源论，乃是汉魏以来的惯常之论，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中的文学起源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的文学观念，亦大同于此。从上古至魏晋以来的文学发展流变考察，沈约总结出“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认为三曹之文学创作的特点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建安文士以气质为体。这些流变虽然千变万化，“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这种文学起源论与本质论，与汉魏以来的文论大体上是相符合的。但是他的声律说的导出，却与这些观点大相径庭：“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约这些话的内在逻辑上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那么何来“妙达此旨，始可言文”，也就是说，只有悟会“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声律，才可以作文，这样一来，作为形式要素的声律，岂非成了作文的决定因素，与他的文学起源论与本体论互相抵牾？所以，沈约接着又说“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但那样的话，证明高明诗作并不需要妙达此旨，也说明了沈约声律说的矛盾不通之处。

因此，首先起来反对沈约声律说的是与他有过交往的钟嵘。据曹旭先生《钟嵘年表》说：“梁武帝天监十四年乙未，四十八岁，钟嵘完成《诗品》。”^②《诗品》虽成于梁天监中期，但其酝酿写作却是在永明时代，从永明四、五年到永明末，钟嵘与在京邑的文学之士多有过从，他曾在永明后期，与谢朓论诗，与王融争论过诗歌的音律问题，又曾求誉于沈约，与永明体文人的接触与讨论，启发了钟嵘的声律说。钟嵘对沈约等提出的声律论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在《诗品序》中认为曹氏父子、建安、太康文士为文章之圣，难道他们不懂宫商之辨、四声之别，只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诗歌配合入乐而具备的，现在既然诗歌脱离音乐而单独存在，就没有必要再来讲究四声与宫商之辩了。钟嵘倡导自然声韵说：“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③钟嵘提倡“自然英旨”的诗歌美学，批评声律之论妨碍了自然英旨的表达，“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至于沈约所说的“自《骚》人以来，而此秘未睹”，《南齐书·陆厥传》记载：“厥与约书曰：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岨岨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④陆厥认为，沈约所说的前人对于声律“此秘未睹”，并不符合事实，建安时的曹丕等人就已经提出以清浊论文，可见，声律说在当时已经存在。沈约辩答曰：“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阉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⑤沈约则辩称前人虽然体会到声律的运用，但是其中的参差变动并不清楚，只是朦胧地感受到而已，沈约同时也强调这其中的变化宜顺应自然之情。这些争论，客观上也推动了

① 沈约：《宋书》，1176-117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② 曹旭：《诗品研究》，36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③ 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27-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④⑤ 萧子显：《南齐书》，611、6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当时人对于声律问题的认识,其中自有其积极意义。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沈约与陆厥等人关于声律的论争,究其实乃是在永明年间为了避开当时的文学表达现实而采用的一种策略。在中国文学史上,唯有永明体仅仅是以声律说作为标志,而在内容与形式上一无所为,遗缺了这个时代士人真实情志与心声,这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思。永明体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并没有出现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即是证明。

梁武帝虽然与沈约同为竟陵八友,诗文交往很多,但是梁武帝对于沈约倡导的声律说并不感兴趣。《南史·沈约传》记载:“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约也。”^①梁武帝对于沈约故意炒作声律说、特别是对他的自夸颇不以为然。这也说明沈约的声律说刻意炒作的背后有其隐情。当时,沈约的自大已经成为他的蹈祸之门,《南史·沈约传》记载:“先此,约尝侍宴,会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约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②后来因为其他事所引发,梁武帝“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有司谥曰‘文’,帝曰‘怀情不尽曰隐’,故改为隐”。由此也可以看出,沈约的善于利用文才进退,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如他父亲那样的人生悲剧。

小结

自南宋严羽以来,永明体作为一种融思想内容与文体相合一的概念著称于文学史。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指出:“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黄初体(魏年号,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正始体(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太康体(晋年号,左思潘岳三张二陆诸公之诗);元嘉体(宋年号,鲍颜谢诸公之诗);永明体(齐年号,齐诸公之诗);齐梁体(通两朝而言之);南北朝体(通魏周而言之,与齐梁体一也)。”严羽认为,自从建安以来,形成了以时代风格为特征的体式,永明体便是其中之一,与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相提并论,这里所谓的“体”,实际上是内容与体式的统一。既然是一种文学的时代体式与风格,自有其内在与外部的原因所造成,但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于永明体的背后原因,大都语焉不详,认为永明文学与永明体是一回事。例如近人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大文学史》中第十八章《永明文学》指出:“盖永明文学,承元嘉之后,更研钻声律,于是四声八病之说始起,立骈文之鸿轨,启律诗之先路。”还有的将永明体视为永明时代社会繁荣的产物,没有看到其中复杂的关系。凡此种种,都遮障了我们对于永明体与永明时代关系的深入研究。

实际上,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极其复杂,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真实地写出了社会现实,抒发了作者的真实思想情感,如东汉末年的建安文学,以三曹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学思潮,以真实反映社会现实、慷慨仗气为特征,史称建安风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指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钟嵘《诗品序》中也指出:“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乏其有,例如盛唐之音与盛唐之治的关系。

然而,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与时代的另一种关系,则是对于外表承平、内里凶险的现实采取一种逃避现实、自我麻痹的态度,文学作品及其体式是逆向地折射时代情况。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与文

^{①②} 李延寿:《南史》,94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士，素来有粉饰太平的习惯，善于用文学来掩盖内心的恐惧感，营造自我逃遁的假象。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等杂文中，多次批评了这种文人心态。例如，《文心雕龙·时序》就指出：“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① 刘勰指出，东晋虽然变乱频仍，但是文学辞意夷泰，沉溺玄风，不关世事，反映出东晋士大夫得过且过、自我麻痹的心态。钟嵘在《诗品序》中也指出：“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也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再如三国时魏朝正始时代，政治凶险，玄学兴起，何晏等人的诗作，篇体轻澹，以游仙与玄谈的体式，反映出当时文士畏祸自慰的心理，并没有写出当时的真实情境，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批评：“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② 这些都说明，六朝时代的社会现实与文学写作的关系并不总是顺向的，有时往往是逆向的折射，成为士大夫逃避现实的幻影，永明体便是以折射的方式，反映出永明十一年的一年的时间里外表承平而内里凶险的现实，以及君臣之间的复杂心态。沈约死后被梁武帝批评“怀情不尽日隐”，也说明沈约所倡导与鼓吹的永明体正是他所代表的永明文士扭曲隐约心态表现。同时，永明时代的文化也是多元交织的，永明体作为诗歌创作与理论主张，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完全覆盖永明文学，更不能用来说明永明文化的全部，对于它的出现及其评价，应当加以全面的分析与论述才是。

Re-Exploration of the Yongming Style and Yongming Era

YUAN Jixi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Yongming Style was a poetic school produced in Yongming Era of the Southern Qi dynasty. In Yongming Era, the appearance of peace was inherited, while the political struggle of the ruling group was extremely intense, which brewed calamity. Scholars wandered between various political factions and groups, and their mentality were rather complicated. By glossing over the peace and discussing the rhythm of poetry, it gave birth to the theory of Yongming Rhythm with four sounds and eight diseases as its cont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Yongming Style and the Era was extremely complicated. It was not only a simple reflection of the external stability of the Yongming Style, but also a sign of its flatness. For its research, we should see the essence of the phenomenon and reveal its true meaning in depth.

Key words: Yongming Style; Yongming Era; literati group; rhythm theory

(责任编辑 张 静)

^{①②}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675、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